

辽宁卷

LIAONING

China's Popul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ies

世纪之交

的

中国人口



中国统计出版社
China Statistics Press

世纪之交的 中国人口

China's Popul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ies

辽宁卷

辽宁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China Statistics Press

(京)新登字 04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 辽宁卷 / 辽宁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8

ISBN 7-5037-4479-0

I. 世…

II. 辽…

III. ①人口—研究—中国②人口—研究—辽宁省

IV. C9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8835 号

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辽宁卷

作 者 / 辽宁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责任编辑 / 陈越月

装帧设计 / 大路策划

出版发行 / 中国统计出版社

通信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75 号 邮政编码 / 100826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甲 6 号

电 话 / (010) 63459084、63266600-22500 (发行部)

印 刷 / 河北天普润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 1092mm 1/16

字 数 / 400 千字

印 张 / 29.5

印 数 / 1-1000 册

版 别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版 次 /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037-4479-0/F · 1933

定 价 / 58.00 元

中国统计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统计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百年回望 继往开来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2000年是中国传统的龙年，世纪之交又值千禧之年，回顾历史，瞻望将来，具有特殊的意义。

人类改变了世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对人口过程、人口现象、人口问题科学的综合考察必须从大历史观、大战略观的角度出发。人口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系统、深入地分析和总结中国人口的发展规律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最新近、最完备、最丰富的人口信息，是透视中国国情极其重要的一扇门窗。同时，它也是揭示中国人自身奥秘的一大宝藏，期待着世人的开发。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适时组织国内各方面的精干力量，合作撰写和出版了合计千万字的《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系列丛书巨著一套35卷，包括了全国总卷，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台湾各一分卷。丛书条分缕析地全面展示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其中，既有对历史的回溯，也有对现实的剖析和对未来的展望。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深刻展示了中国人的现状、特征和发展。

20世纪的中国人口，数量迅猛扩张，结构有待优化，素质亟

需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口增长势头逐步得到控制,近年已进入低生育时期,世纪之交中国人口增长由人口惯性决定,人口工作的重心移向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翻开了中国人口历史崭新的一页。

从这套书中,读者朋友可以感受到20世纪和21世纪历史接力的世纪回响,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口政策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制度环境中强烈的激荡,可以感受到百余年来为强国富民魂牵梦萦的民族理想的探索。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适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到2020年前后要从“不全面的小康或者说总体小康”达到“全面小康”再到本世纪中实现“基本现代化”。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中国的发展可能进入快车道,也可能陷入停滞不前的陷阱,我们应当树立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放眼未来,如何使一个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将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视野中,将庞大的中国人口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主体”,这是上至中央、下

至地方，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必须严肃对待的新课题。毫无疑问，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支持。新发展观呼唤着新人口观。正位、积健、高远的大人口观将把我们引向更深层的思考，探询“数据中国”背后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天人合一的人文底蕴，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

人口科学依然是一门朝气蓬勃、不断发展的学科，在中国，因人口数据的丰富和人口问题的复杂，其触角已从传统的人口研究领域伸向更广阔无垠的空间。中国人口低生育水平已接近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家庭养老危机初现端倪，人口流动的潜能不断释放，人口城镇化严重挑战现存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建设，而人类全面发展的要求对国家和社会管理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套书里，留下了求索者认真的思考，也留下了对后来者殷切的寄望。希望作者们有益的探索能激起社会的共鸣和行动。

蒋心华

2004年4月

前言

昨天·今天·明天：辽宁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百年观

翻开辽宁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发展的画卷，令人不胜感慨。历史的车轮隆隆地驶过，从过去走到现在，又从现在走向未来。无论它的过去曾经沧桑，或者曾经辉煌，也无论它的现在面对多少挑战，或者多少彷徨，既然时间伴随着车轮滚滚而去，不可挽留，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踏上时代的列车，与时俱进，同她一起走过……

昨天

早在远古时代，上苍已把辽宁这片热土造就成十分优越的人类生存环境，并把她赐给了我们辽宁人。辽西的大量鱼鸟化石向我们表明，那里曾经是水草丰盛、鱼鸟众多的地方。在辽东、即使在百年前还可以看到茂盛的原始森林，早年人们曾用“棒打獐子瓢舀鱼”这样生动的语言来描述这里生气勃勃的自然景象。时至今日，虽然辽宁大地上还流淌着大小河流 360 余条，总长达 16 万多公里，但昔日的茂盛植被和众多的飞禽走兽已不复存在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营口大石桥金牛山古人类化石遗址表明，人类在这里已至少繁衍生息了 28 万年；浑河河畔的沈阳新乐文化遗址昭示，7000 年前我们人类曾在此建立起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更进一步表明，5000—6000 年前我们人类曾在这里经历了母系社会。辽宁的多处古人类文化

遗址都证实，辽宁这片热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在古代早期，这里的辽宁人以渔猎和游牧为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口增长极其缓慢，所以人口一直非常稀少。

汉朝，中国已步入了农业社会。这时，辽宁地区的农业也有了初步发展，并且冶铁和煮盐业也初具规模，这里的人口逐渐增多。到西汉平帝时期，辽西、辽东两郡人口已近60万，这是辽宁在古代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期。

从东汉末年到隋唐，其中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300余年，期间，辽宁地区战乱不断，人口迁移十分频繁。特别是北魏对后燕战争之后，辽宁地区的人口更加稀少，当时辽西仅剩千余户，人口不足5000人。在此期间，辽宁地区曾被两个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统辖，一个是鲜卑族，他们在辽西地区建立了“三燕”，后被北魏吞并；另一个是高句丽，他们在辽东取得了控制权，后被唐朝平定。

唐朝以后，中国又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这时，早在西周时就生活在东北的古老民族东胡族后裔契丹族逐渐壮大起来，他们“乘虚而入”，在辽宁建立了辽。辽代历史长达200多年，这一时期是辽宁地区在古代连续发展经济的最长时期。这一时代辽宁的农业、丝纺、制陶和冶铁的生产能力和工艺水平都有了极大提高。在整个古代史中，辽代是辽宁在农业社会中屈指可数的昌盛时期。

取代辽的是东北的另一古老民族后裔女真族，女真在辽宁地区建立了金。由于金对中原的战争，把当时的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在百年的金朝，辽宁人口进入古代史上又一次高峰期，人口总量曾接近300万。

百年以后，金又被东胡族的另一分支的后裔蒙古族所取代。

蒙古族在辽宁地区与金的战争长达20余年，之后他们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元朝。到元朝末年，多年的战乱使辽宁地区的人口锐减，与辽代末期人口相比减少了近90%，只剩下30多万。

明朝在辽宁地区实施了鼓励女真族和其他民族在这里安家、开垦土地的政策，所以，在这一时期辽宁的农业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特别是集市贸易发展尤为显著。当时，不但辽宁地区的蒙古族、女真族和汉族之间有较强的贸易往来，并且山东、河北、山西、苏州、杭州等地商人也或从陆地或从海上纷纷来此交易。当时的贸易之所以如此兴盛，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交通运输特别是航海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的辽宁可以提供大量的人参、貂皮、木耳、蘑菇、松子及各类药材、马匹、牲畜、木材等土特产品。到明朝后期，辽宁的人口已由元朝末年的30多万增加到400多万，这是辽宁在古代史上的第三次人口高峰。

明朝后期，女真人在辽宁再一次崛起。女真人在努尔哈赤及其后人的统领下，与明军在辽宁地区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战争，并于1644年5月1日打入北京。后来他们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军与明军在辽宁的持久战争，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在这一时期，这里的平民百姓或死于战乱，或逃往关内，其人数总计多达200万，当清军入关时，又约百万随从人员和家眷奴仆跟随入关。因此，这一时期辽宁人口大量减少。清军入关10年后，人口也仅有30多万。

在清朝，辽宁的经济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和发展，相反，却受到了严重的控制和制约。清王朝为了所谓的维护“祖宗肇迹兴旺之所，保护发祥之地”，把辽宁视为满族的特殊领地，实施了种种特殊的封禁政策，并且严格禁止关内人口出关进入辽宁地区。这样，辽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置于战争后的一片废墟。据《奉天

通志》记载，清国入关20年后，辽宁地区仍然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清朝对辽宁地区的封禁，时间长达200来年，虽然期间也有局部松动，但真正开禁迟至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清朝对辽宁地区的封禁严重地阻碍了辽宁的经济发展，但在客观上也保护了辽宁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在清朝，由于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和农业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人口在封建社会里增长最快时期，到1840年，中国人口已达到4亿以上。这时，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已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人口群体压力，所以每年都有一些破产者和逃荒人从古北口和喜峰口进入辽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辽宁人口达到240万，但与关内很多省份相比，仍属人口稀少地区，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两个省江苏和四川的人口已达到或接近4000万。

总之，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辽宁地区是一个战争多发、人口数量波动幅度大、人口迁移频繁、经济发展屡遭破坏的地区，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纷争的地区。到了古代末期，辽宁变成了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经济落后和人口稀少的地方。在中国其它土地上，象辽宁这样的古代社会变迁较为罕见。

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开始登陆辽宁。首先是英国在辽宁取得牛庄和营口的口岸权。继英国之后，美、法、荷、德、俄、日等国于1866年先后在营口设立了领事馆，同时在这里取得了居住权。从此，大量的外国棉线、布匹、火柴、砂糖、烟草、面粉等商品占据了辽宁市场。这样，辽宁的手工业遭受重创，辽宁的近代工业发展也受到了压制和阻碍。并且，这时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开始进入辽宁，美国、丹麦和日

本的外资企业和官商合办的企业也相继出现。

19世纪后期，在中国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山东、山西、河北一带连年出现灾荒，而这时地广人稀的辽宁及东北地区就成了逃荒者的唯一可去之处。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清朝政府为了减缓关内的人口压力，被迫采取对到东北开垦土地的人进行鼓励的政策。在这一时期，每年大约有10万人来到关外，他们或在辽宁落户，或进入东北其它两省地区。到光绪十八年（公元1893年），辽宁人口已增加到430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辽宁当时的可开垦土地已基本全部得到开发。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对辽宁后来社会变迁影响巨大。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完全取代了沙俄在辽南的霸主地位，他们在辽宁的特权进一步增大。如果说在日俄战争之前帝国主义主要是掠夺东北的大豆和一些自然资源的话，那么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开始在辽宁掠夺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掠夺的资源，这个矿藏十分贫乏的国家，尤其看重辽宁的矿藏资源。如果说当时的其他外国列强还只是想方设法地从辽宁及整个东北掠夺更多的资源的话，而这时的日本已开始谋划如何永远占据辽宁及整个东北。当时的日本政府认识到自身还没有能力完全吞并辽宁及整个东北，所以，他们首先不断加快对辽宁的经济扩张，除了以政府出面直接指挥占据辽宁的主要经济部门外，同时还竭尽全力地支持国内各个垄断财阀和各类大小资本家到辽宁来开矿设厂，经营一些可经营的行业。到20世纪初，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日本在辽宁经营的各类企业和公司，从1907年的11家猛增到1926年的近1200家。

在这一时期，辽宁开始被迫走上了一种畸型的工业化道路，同时，畸型的工业化也带来了畸型的城市化。当时辽宁自身的经

济发展水平还只是处于封建农业自然经济和手工业阶段，所以，这样的殖民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辽宁来说，不只是畸型的，而且是早产的。当时辽宁还没有发展工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更不知道如何正确发展自己的工业，因此，殖民主义者在辽宁搞起的工业和由此促进的城市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影响辽宁后来的发展。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开始走向灭亡。由于关内的战乱和灾荒严重，辽宁迎来了又一次“闯关东”的高峰期。这次“闯关东”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出关到辽宁的人绝大部分是来此开垦可耕地从事种植业，也有一部分从山东来从事养蚕业，而这次来辽宁的人已很难找到可耕的沃土，他们只能到丘陵和山地去开垦，或者进入辽宁的矿山、工厂企业，成为辽宁近代企业的第一代工人。从1898年到1911年，仅仅13年，辽宁人口从500万增加到1100万，这是辽宁从古代到近代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也是人口迁入的又一个高峰期。

综上所述，辽宁在近代史中有两点最突出的变化，一是殖民地工业在辽宁产生；二是大量关内逃荒和破产人口迁移到辽宁。另外，近代末期以后，辽宁的自然环境、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开始遭受大面积破坏。昔日的草原被开垦成耕地，昔日的原始森林开始遭到毁灭性砍伐，辽宁的河流开始干涸并受到工业污染，城市人口虽然明显增多，但这些城市却越来越破烂不堪。总之，辽宁开始为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生产力低下的人口膨胀以及殖民地经济付出高昂代价。

民国初年，奉系军阀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利用军阀官僚资本大力发展军火工业。当时辽宁已能够生产飞机主要零部件，火炮枪支和各类弹药，奉系军阀的军工企业规模之大、设备之先进，

是全国其它地区的军工企业无法与之相比的。

辽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完全垄断了辽宁的经济命脉，日本政府为进一步侵略和扩张的需要，已把辽宁视为他们“准备战争产业开发”和“生产军需品”的基地之一。为此，日本在辽宁极力加大对能源工业、基础原料工业和机械工业的扩张，并且使辽宁的机械工业更加军事化。与此同时，在辽宁的农村，日本为了维护其法西斯统治，野蛮地强行归屯并户，致使大量土地荒芜。并且，他们还推行了所谓的《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大量抓派劳工，使本来就生产力低下的辽宁农村劳动力不断减少，辽宁的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由于殖民地经济在辽宁不断扩张，殖民地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使得辽宁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也不断增强。在这一时期，辽宁又陆续地接纳了大批的“闯关东”人。到1945年，辽宁人口已接近2000万，这是新中国成立前辽宁有史以来的人口数量最高峰值，其中城市人口从1937年的200万到1945年增加到400万，占总人口20%以上。

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于种种原因，辽宁的很多工矿企业已处于半瘫痪和完全瘫痪状态，加之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很多人离开了辽宁。到新中国成立初，辽宁人口总量回落到1830万。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辽宁人民经历了百年的磨难，辽宁社会经历了百年的被强迫的社会变迁。这一百年，是辽宁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百年，是殖民地经济在辽宁不断扩张、辽宁的宝贵资源不断被掠夺的百年，是关内大量的逃荒、逃难人不断“闯关东”迁移到辽宁的百年，是辽宁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不断被破坏的百年。百年里，由于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使得辽宁较早地改变了以封建农业自然经济和手工业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走

上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然而，这却是一种病态的、畸型的、被掠夺和被破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

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振兴之路，尽管这条道路并不平坦。辽宁人民也与全国人民一样来建设自己的家园，尽管这个建设面对着诸多挑战。

建国初期，特别是在“一五”时期，国家为了发挥辽宁的工业和矿藏优势，对辽宁进行了大量投资。在全国的支援下，经全体辽宁人民的艰苦奋斗，辽宁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辽宁不但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殖民地工业性质，而且成为以冶金、机械、化工、石油、煤炭、电力、建材等工业为主体的全国重工业基地。在这一时期，辽宁为全国生产和提供了大量的各类物资和产品，同时还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技术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总计达8万余人。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由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时，几乎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中国也未能幸免。在中国完成“一五”计划后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先后受到“大跃进”、“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经济已接近崩溃的边缘，而这时的辽宁更是“重灾区”。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批判声中，中国盲目无计划生育人口延续了20多年。辽宁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年平均出生人口分别达76.7万、87.6万和62.6万，30年共出生了2270万人口。

不难推算，如果我们在建国初期就执行既使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今天的辽宁至少会减少1000万劳动年龄人口的

就业压力，而总人口将会减少1500万。但事实上，1953年辽宁总人口为1854万，1964年上升到2694万，1982年又增加到3572万，1990达到3946万，2000年辽宁人口已达4182万。

建国以来，辽宁的城镇化发展与辽宁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是完全同步的。在建国初期，国家为了尽快地建立和发展重工业基地，陆续向辽宁调入了大批各类人才和大学毕业生，他们是有史以来迁移到辽宁的最优秀最有文化的一批人，是后来辽宁工业基地建设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同时，在这一时期由于辽宁发展工业的需要，辽宁部分农村人口也转移到了城市。从建国初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辽宁的城镇化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由24%一跃达到了41%。但是，60年代到80年代初，辽宁的城镇化水平却始终徘徊不前，期间由于“十年动乱”和“上山下乡”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年份出现了水平下降的现象。1990年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人口的产业分化，大量小城镇建立，辽宁的城镇化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达到51%。到2000年，由于城市建设投资力度加大，特别是各级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辽宁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到54.9%。目前，辽宁的城镇化水平在全国各省、区和直辖市中位居第五位，仅低于上海（88%）、北京78%）、天津（72%）和广东（55%）。

新中国成立至今，辽宁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显著的。在建国初，辽宁仅有大学8所，今天已发展到66所。1982年辽宁每十万人中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程度的人口为1020人，1990年提高到2600人，2000年又提高到6180人。在全国各省、区和直辖市中，辽宁人口总体文化素质仅低于上海、北京和天津。

辽宁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有众多的城市和城市人口，辽宁人

口的文化素质较高，可是，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的经济发展却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落后于胶东半岛。

1982年，当全国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已达到86.7%时，辽宁只有29%。辽宁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比全国先进省、市晚了整整一年。改革开放初期，当大批的勤奋、精明、吃苦耐劳的关内和南方人“闯关东”时，当时作为早年“闯关东”的后代的辽宁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悠闲地呆在家里受穷；当全国各地私营个体经济纷纷兴起，并且都已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有的甚至已为今后发展完成了早期的资本积累时，辽宁的绝大部分职工还是宁可呆在原单位里无所事事，不愿意也没有勇气丢掉多年端惯了的“铁饭碗”。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计划经济已逐渐被市场经济取而代之，四川走出来了“长虹”，山东走出来了“海尔”，而辽宁的多家电视机厂、洗衣机厂、电冰箱厂却都没有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大浪淘沙，甚至有的已销声匿迹了。这时，辽宁的国营企业已陷入了困境，亏损十分严重，国有企业亏损额占工业企业亏损额的83.3%。

当时省委省政府面对辽宁的经济窘境，回顾了辽宁的改革历程，把辽宁概括为“经济体制老化、产业结构老化和思维方式老化”。实际上，在这三个“老化”中，“思维方式老化”才是辽宁问题的“根”。在改革开放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辽宁之所以谨慎有余，开拓不足，辽宁人之所以这样被动、消极，绝非偶然，它有深层的历史根源，我们需要深刻地思考自己。

辽宁人口的主体是在近代以后逐渐由迁移人口形成的，而这些迁移人口不是家族人口和集团性人口迁徙，他们是由一批批逃荒逃难的“闯关东”人集聚成群。他们没有文化积累，没有经济

财富，他们“闯关东”只是为了求生存。不难想象，这样的人口群体，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条件下，不可能具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实力和竞争意识，更何况辽宁长时期也从来没有过公平的市场经济条件。可以说，辽宁人在辽宁的工业化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过去任人摆布倍受煎熬的辽宁人非常欣然地接受了计划经济体制，并且很快就习惯了“听从指挥”、“等待安排”。

如此形成的辽宁人口群体，又经历了上百年的特殊历史变迁，很自然地会形成一种辽宁人所特有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一直长期在一代代辽宁人身上明显地表露着和传递着。大概由于“闯关东”的经历，辽宁人从来不缺少勇敢，更有艰苦创业的精神，但却不善于精打细算，也非常缺少风险意识和防患于未然的思想；辽宁人豁达、开朗、豪放，但却有随遇而安的习惯，非常容易满足，更是缺少不断创新的意识。从辽宁的近代历史中还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对于辽宁人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课题，所以，辽宁人缺少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和竞争意识，缺少拼搏精神，在这方面，辽宁人还只是个小学生。

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里，辽宁人或自觉或被迫地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今天，在辽宁的农村，改革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农民，已有很多人走出了家门，到城市里去打工、去经商，他们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在辽宁的城市里，已从原单位里“分流”出来的“富余人员”开始重新自谋职业。辽宁人无法回避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辽宁人不得不为昔日的“思维方面老化”而在今天付出高昂的代价。

从经济、人口和人文的视角看今日辽宁，辽宁确实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同时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辽宁也发生